



昔日东昌依绿园

■ 刘洪山

听闻依绿园复建工程早已告竣,古园重光,是可喜之事。念及此园,我总想细细了解一番:它最初是如何营造而成的?盛时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致?乘这个好奇心之兴,借助史料寻觅它的建造起因、盛时旧貌,对发掘弘扬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具现实意义。遥想名园盛时风貌,探寻复建后的新意,触景思古,更能加深对新景观的理解深度和乐趣。

历经四朝营造

依绿园的形成过程,在胡德琳的《依绿园记》和乾隆版《府志·古迹》中有记载,根据这两段文字记述,参照其他史籍记载,应是:

宋朝时,在城墙西北角建了自公亭。

到了元代,“徐某将自公亭改建为绿云楼,也称绿云亭”。徐某,即“徐世隆,字威卿,西华人,至元九年(1272年)由翰林侍讲学士补东昌路总管,至都专务以德,率下不事鞭箠,期年而政成,郡人颂之,祀名宦。”(嘉庆版《府志·名宦志》)箠,本义为竹制打人的刑具,后借以称杖人为箠。

到了明朝,据万历版《东昌府志》卷三“建置志·官室”记载:“在府城西北隅元为绿云亭,今改为楼。”李廷相在《重修东昌府城记》中称:“城上了望之楼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楼在焉。”可设想,明初改建为砖城,在城上重建,被列为东昌八景之一:绿云春曙。

至清代乾隆时期,“黄铨扩地为园”。黄铨,镶红旗人,监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任东昌知府,以自己的薪俸在城下复建了园内部分亭馆;韦学使谦恒提其额曰“得水”。据《科举辑要》记述:韦谦恒,字慎旂,又字慎占,号约轩,江南芜湖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应乾隆帝南巡召试,赐举人,癸未科大考位列探花。三十三年(1774年)九月,奉命督学山东,次年以待读学士提督山东省学政。这期间,他见此园南北积水,题额“得水园”;胡德琳重修后,得到杜申《陪郭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五律的第一首颌联“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诗句的启示,或许以为何将军的山林依赖“绿水”而成了名园,我们园林也有“绿水”可依,于是题名“依绿园”。

胡德琳修葺成名园

胡德琳,字碧映,因藏书多,又字书巢,广西临桂(桂林)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转任多地地方官,三十五年(1770年)任东昌知府,四十年(1775年)因事被革职,四十二年(1777年),起用为莱州知府。四十三年(1778年)复任东昌知府,任内编纂了五十卷本的《东昌府志》,建了启文书院,还重修了城隍庙,他祈盼借助神灵保护百姓幸福平安。东昌人感激他,后任的官员也敬佩、赞赏他的政绩,道光年间(二十二至二十八,1842年—1848年)任东昌知府的朱锦琮在增列“七贤祠”“旁以郡守胡德琳配祀”,这是唯一一位非东昌籍而在七贤祠享祀者。

园内景点的布局,胡德琳的《依绿园记》说:“凡为景十二,各系以诗命名之,义则详于诗之小序云”。遗憾的是,“府志”及相关文籍收录了诗并未收录小序,这就不能理解其命名的原意,只能从字面推测。其实写园景的诗不止十二篇,现见到的诗篇有胡德琳的五绝十六首;张开东古体诗一首;张官五咏依绿园景七绝八首;章典七律一首。

他在此记中按游览路线作了叙述:“园在宅西数十步,前抱经历司旧制,缘司署后垣凿渠以达于池,形象以直射宅之西,位非宜。乃浚池取土以平之,筑室于砥霡”。凡游于园者,自北始。斋墟百余步,面园者曰‘晚晴书屋’。前有渠通池之南,北又开支渠,两水夹出而成洲,筑亭其上,曰‘小玲珑洲’,左、右为双桥跨东、西渠之上。又西为‘丽衣山房’,有三峰直矗其右,稍迤而南,平列如屏者,曰‘南章山房’。后筑台突出水中,曰‘枕流漱石’,凡此又自为一洲。由三峰而北,渡桥缘池行,稍西,林木特茂,曰‘绿云深处’。又北行,面南有高耸者,曰‘北楼’,与枕流漱石台相望,园之北境止矣。由晚晴书屋沿渠而南,当水曲处有亭,翼然隔水与南章相隐映者,曰‘可亭’。由可亭循墙而西,有桥北通三峰、南章间。南则长廊,曰‘邀月步’。水西有亭,曰‘蓼庵’,通以‘略约亭’,亭三面环水,垂杨四五株,园之南境也。”文中所说的“砥霡”,砥,磨炼、修

养,即磨炼修养之书房;“章”,《字汇补》谓“章与障同”,或南章是“南障”义;垂柳,即垂柳,古诗文中杨柳通用;略约,即小木桥。

张开东的《依绿园记》从中心建筑丽衣山房开始逐点描述:“依绿园依城之西北隅,周围几里许,列十二景。其中曰‘丽衣山房’,以房之西,垒土为三峰若华山之形,故曰‘丽衣’。其南为山,曰‘南章’。南章之西南,左曰‘邀月步’,右曰‘蓼庵’。其东曰双桥,通‘晚晴书屋’及‘砥霡’。双桥之间,北曰‘小玲珑馆’,南曰‘可亭’。丽衣之北,三面临水,曰‘枕流漱石台’。其合之西北,有桥通林荫之中,有亭曰‘绿云深处’。迤而北有楼,曰‘北楼’,与丽衣正相望,而中有横堤。其后(景观)增以四,曰‘伴鹤居’,曰‘小方壶’,曰‘麦浪坡’,曰‘小沧浪’。小沧浪者,丽衣山房之东廊也。数柳蓊蓊,有水步,可以登舟。余又增以二:一曰‘樵麓’,南章之南丽衣山房之西有卉木芜蔓者,可芟而除之;一曰‘鱼梁’,西北之渚停泓而鱼聚,可观可钓。凡园之中,屈曲皆水,若池若沼,若涧若溪……”文中攀,即长垂;芟,即割草,引申为除去。

张开东(1702年—1781年)字宾阳,别名白菴,号青梅居士、海岳游人,茅山张家人,是客居历下的文士贡生,是当时的著名书画家、旅游家、文学家、诗人。他应胡德琳之约,游历岱岳后来东昌府,“憩居园中月余,日涉其趣”,写下了这篇《依绿园记》。

感皇恩是葺治名园的起因

胡公在《依绿园记》中说:“先是余承乏此土,郡中仍岁被水。朝廷发帑赈济,民以不饥。明年翠华临幸,稚藎欢迎,上为顾而色喜,于是始建‘观和之堂’,盖取赐诗之义,以志荣光……去冬,得雪盈尺,郡父老以为十年来所未有。”

张开东在《依绿园记》中写道:“胡公书巢守东昌三年,岁丰而民和,天子东巡为之霁顾,见于诗。太守乃建‘观和之堂’,辟依绿之园……”

文中所写的“承乏”,即继承空缺的职位,多为任职官的谦辞;翠华,原为用翠羽饰旗杆顶上的旗,这里比喻皇帝的仪仗;临幸,皇帝亲临称“幸”;上,对皇帝的尊称;稚藎,老幼;霁顾,担忧消散,平和地回观看有喜色。

序的意思是说,胡来东昌之前多灾荒,来后,依旧“秋大水,八月蝗”,朝廷赈济,百姓没出现饥荒。次年三月乾隆帝来巡,“顾而色喜”并赐诗。

乾隆帝赐的诗是怎样呈现出“顾而色喜”的?《东昌府志》首卷“宸翰”中收录了这首五律《过东昌府城作》,诗曰:

御舟叙运河,策马府城过。为便民之觀,兼观俗可和?
轡前复鞭后,踵接与肩摩。皆视如伤者,羽林漫禁河。
——辛卯暮春月中浣御笔

诗中写的叙,即靠岸;策马,骑在马上用鞭赶马;觀,朝见;俗,百姓、民众;和,喜悦、和谐;伤,过度,疲劳;羽林,保护皇帝的御林军;漫,轻慢、没礼貌;河,斥责,责骂。全诗意思是说,皇帝乘坐的舟船停靠在运河边,骑着马走过东昌府城,一是为了便于人们朝见,也兼看百姓可否喜悦和谐。马的前后百姓拥挤接踵连肩,看到候驾的百姓都像累得疲劳过度,御林军对他们不要阻止、斥责谩骂。

全城“稚藎欢迎”圣驾,皇帝关怀民情,而且呈现“色喜”,这是多么祥和的盛景。作为一府之长的胡德琳当然高兴。这一年老天惠及风调雨顺,为百姓带来“岁丰民和”,为感恩朝廷的钱粮救助,和“以志荣光”,即借“观俗可和”句中观和二字建“观和之堂”,“岁丰民乐”社会安定,诉讼案件大减,知府得以闲适,又在得水园基础上“辟依绿之园”。

建园饱含爱农、重农厚望

胡公又作《依绿园后记》,进一步阐述建园之义:“夫农为邦本”,盖“为稼穡艰难而作也,况守土之责以农力本为首务”。“昔人以劝农而有美农之台,今园之亭馆以丽衣为主,丽与美其义同。”

他见到“依绿之西南蓼湾也,向皆黄茅白苇,予既葺蓼湾之享。于是披其草莽,芟其荆棘,得隙地于亭之右”,“时犹可降麦”,于是“架梁以墼以甃”耕种。地邻池,“虽旱不竭,故麦垆之土甚滋,然大雨时行水之来颇猛,故于北楼之南、枕流漱石台之北为横堤约之。作涵洞,以为节蓄。堤上压以重檐之亭,曰‘小方壶’”。“工成时候方小雪,而瑞霰频集……天将以滋我麦乎?”关于取名“丽衣”,张开东在“记”中解释了它的深层寓意,他说,“垒土为三峰若华山之形,故曰‘丽衣’”。

为什么“若华山之形”就称“丽衣”呢?他们把堆土制成的三峰比作华山,华山之东为古郡“弘农”之地。弘农,字面意义为“弘扬农业”,于是这里就取名“丽衣”。

文中“墼”即耕;“甃”即锄。稼穡,春耕为稼,秋收为穡,即播种与收获,泛指农业劳动。

胡公既感到“有之政如农功、日夜思无有越畔,后之人同我志者,自必无废斯义矣!”并期望日间忙于政务,夜间来此“憩息”,提醒不要忘了思考农功。他大声呼唤重农,不但自己以身作则,更是对后人的恳切劝诫!

他的“丽衣”思想,在他咏景诗十六首的《麦浪坡》中表现得充分:

双歧何日秀,三白已呈祥。
细浪油油碧,风吹饼饵香。

歧,也书为歧,即分岔,麦叶分腋;三白,三度下雪;饼饵,糕饼。意思是何时展现麦叶分腋、导股、抽穗的秀美?三场雪已呈现丰收的迹象。风一吹出现的麦浪油亮碧绿,好像已闻到诱人的糕饼香气。

这首诗鲜明地洋溢着他对“农”的热爱、对济民的农业丰收之向往、欣喜和期盼。他在“记”中说“余踏雪一至园中,因而有作诸君子相与和之”。吴子竹堂所绘《得水园喜雪图》,即此也。岁丰民乐,因时之隙,始为增葺此园,以为守土者公余憩息之所。”更能看出他增葺此园,期望继任官员莫忘重农爱农之心切。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马的驯养是自西向东的传播路径。山东虽然地处东方,至迟在商代,马已经应用于人们所熟知的旅行代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各个方面。周代姜尚封齐,以“煮盐垦田”为基,在“泻卤之地”谱写了东方传奇。自此八百余年间,齐国的军事、商业都是“天花板”级存在。马在这些领域都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与齐国有关的马的故事。

(一)养马、相马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形成若干诸侯国纷争的局面。一个诸侯国马匹的储备量,决定着国家的存亡。齐国有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马的优越地理环境,养马业在诸侯国中捷足先登,为其军事装备的发展提供了领先的条件。齐国北部濒临渤海,南岸滩涂,发源于泰山山脉北麓的若干河流由此入海,地广人稀,水草丰美,是养马的天然之选。在齐都临淄城以北的广饶、博兴、高青一带,是当时齐国重要的养马基地之一。位于今广饶县花园乡西殷村的西殷故城遗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600米。该城始建于春秋时期,沿用至秦汉,当地百姓俗称该城为“养马城”,应为齐国当时饲养马匹的管理机构驻地。这片区域距齐国都城不远,交通便捷,湖泊密布,林草茂盛,是历代齐王狩猎的首选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载:“齐景公有马千驷,田于青丘”。“田”是一种围猎的形式,主要内容是军事演练方面的训练,和现在的军事演习类似。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也载:“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眾罔弥山,掩兔踨鹿,射麋脚麟。”当时以四马驾一车为一乘,驾车的四匹马,中间2匹称“两服”,左右的2匹称“两骖”,这四匹马合称“驷”,这片区域因齐王常率千乘来田猎,故将青丘改名为“千乘”。西汉于此置千乘郡,又置千乘县,汉代千乘城遗址位于淄博高青县唐坊镇。

齐国大规模养马在青丘,国都周边也有养马场所。现在齐故城遗址南侧的南马坊村,相传就是齐国马坊旧址,因处城南,故名南马坊(房)。1998年在该村南修建临淄城区北外环路时,曾出土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石经幢,上有“临淄县南马寺”“天齐乡南马村税户李秀”等记载。有意思的是,202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在南马坊村东南部发现了战国早期的齐国大墓与两座车马坑。车均为单辕车,车体保存完整,长方形车舆,马杀死后埋葬。马头均朝向主墓。这两座附葬的车马坑,是目前山东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在全国范围亦属罕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当时的每个国家都意识到马匹的重要性,养马自不必说,相马术也逐渐兴起。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判断其优劣,通过马的口齿、蹄脚等局部特征判断马的品质,在此经验的基础上总结马的特性。其中老马识途的典故就是很好的证明。

文献记载,齐桓公远赴北地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春去冬归,山中草木凋零,大军没有了参照物,在山中迷了路。管仲想出一计,让军中老马在前面带路。随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它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其后,最后终于走出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这个典故从科学角度剖析,老马识途的奥秘与其独特的生理构造紧密相连。马的鼻腔宽大,嗅觉神经细胞丰富,使得它们拥有超越其他动物的发达“嗅觉雷达”。这一雷达不仅能用于分辨饲料和水质的好坏,还能通过空气中细微物质的气味来辨识方向,找到归途。此外,马的耳翼宽大,耳部肌肉健壮,使得它们的耳朵能够灵活转动,且位置高耸。在内耳中,马配备了一种独特的“曲折感受器”,这一器官能够精确地感知运动方向,并探测周围环境中物体的布局。正因如此,马在记忆气味、声音以及行走路线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甚至有老马能够在阔别数年后,从遥远的外地跋涉数百公里,重返自己的故乡。

(二)赛马、戏马

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这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忌经常和齐威王赛马,三马赛三局,赛前下赌注,三局两胜。田忌的每一次马都不如国王的好,孙臧都很很惨。一次田忌又惨输后告诉了孙臧。孙臧说,你的三个等次的马都不如国王,按常规派出比赛肯定输,应该“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田忌按孙臧的方法,第一局,田忌派自己的下等马,对阵齐威王的上等马。结果可想而知,田忌输掉了第一局。齐威王十分得意。第二局,田忌派出了自己的上等马对阵齐威王的中等马。结果,田忌赢了第二局。第三局,田忌派出自己的中等马对阵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第三局。三局两胜,田忌赢了齐威王。这个故事情节至今,告诉人们做事要有大局观,全局意识,要在整体上取得胜利,有时也要付出一点牺牲与损失。在齐都临淄,当地流传田忌赛马的地方在邠台。这个土台现在还在,邠的本意就是迅速,以此来形容赛马时马飞奔的状态。当然这种传说并不一定可信,《左传》记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邠台,子犹驰而造焉。”这个土台上原应有建筑,应是齐国君臣议事之地。

类似邠台的土台,在临淄周边还有不少。例如桓台,位于桓台新城的西北隅,又名戏马台,相传为春秋时期齐桓公所筑。该土台南高7米,北高9米,

泱泱齐风 骏驰八荒

■ 刘文涛

南北长104米,东西宽112米,台上旧有齐桓公与齐景公庙。当地传说该台为齐桓公戏马之台,《重修新城县志》亦载:“戏马台亦称桓台,齐桓公之遗迹也。”虽然用后代文献来佐证前朝之事,并不一定可信,但与前面提到的邠台一样,都从侧面反映出了齐国对马的重视和齐国的马匹数量之多。也正因桓公戏马的传说,在1914年4月,新城县改名桓台县。

(三)求马、殉马

春秋战国时期,每个诸侯国都意识到马匹的重要性,为求骏马,不惜一掷千金。《战国策》里有个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有位国君,愿用千金买四千里马。可3年过去,未能如愿。国君手下有位不出名的人,自告奋勇能买到千里马。此人用了3个月时间,打听到某处有匹良马,可等他赶到时马已死。于是他用500金买了死马骨头,带回去献给国君。国君看了重金买的马骨头,很不高兴。买马骨的人却说,我如此做,是为让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真心想出高价买马,并不是欺骗别人。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送来了多匹千里马。

燕昭王名职,战国时期燕国国君。他继位后,消除内乱,决心招纳天下能人,振兴燕国,但并没有多少人投奔他。他请教郭隗,郭隗给他讲了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并对燕昭王说,要真心得人才,要像买马骨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知道你是真心求贤。燕昭王认为有理,就拜郭隗为师,给他优厚俸禄,并让他修筑“黄金台”,作为招纳天下贤士的地方。不久,一些有才干的贤士纷纷前来,共同辅佐燕昭王治理国家。燕国逐渐强盛,后命乐毅为将,率燕、秦、赵、魏、韩五国之师伐齐。联军长驱直入,破齐都临淄,后连下齐国七十余城,齐仅剩莒与即墨二城,几近灭亡。唐代李白曾有诗曰:“千金市骏马,万里逐王师。”就是说的这段典故。

这个典故与齐国关系不大,但临淄一件文物的出土却与筑黄金台的燕昭王有了直接联系。1997年7月,临淄齐都镇龙贯村的一位村民在河滩上挖砂,一铁锹下去,挖出一把青铜剑,剑身有铭文,但锈迹斑斑,不能释读。后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朱玉德先生请著名古文字学者孙敬明先生前来鉴定。孙敬明拿起剑摩挲良久,释作“鄆王职作武某旅剑”。其中的“鄆王职”即燕昭王姬职,这篇铭文的意思是燕王姬职作宝剑,赐给心腹将领。前面提到的燕昭王廿八(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这柄宝剑很可能就是那个时期留在齐地的,在淄河滩里出土,或是战时失落于水,也可能是对方缴获后作为陪葬品葬于地下,后河流改道,冲毁墓葬,湮于河中。不管什么原因,这把宝剑的出土为研究齐燕之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齐国重视马,齐国人喜欢马。八百余年间,齐国国君中,与马故事最多的是齐景公。前面提到的“有马千驷,田于青丘”,桓台县戏马台上有齐景公庙,就是死后,在他的墓葬周边还殉了六百多匹马,现在已发掘三百余匹。殉马坑位于临淄区河崖头村西,是齐景公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殉马坑三面环绕墓葬,总长度215米,经1964年、1972年、1982年三次发掘,已初步确定殉马均为六七岁的壮年驷马。坑内殉马呈两列,排列整齐,昂首侧卧,四足蜷曲,最前面几匹颈系铜铃。著名文学家何满子先生参观完殉马坑后感慨良多,曾有诗:“记得千金买骏骨,那知百骊填坟陵。齐既坠落田恒手,岂为骅骝抱不平”。齐景公的墓早年被盗掘一空,唯有这殉马坑大部分保存完好,通过庞大的殉马葬式,可以看出齐景公墓葬的奢侈豪华,也从侧面反映了齐国的国力强大。同时也为研究春秋时期齐国经济、军事、丧葬制度以及马匹储备等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马在齐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桓公称霸,还是景公复兴,都十分重视发展以饲养军马为主的畜牧业,所以齐国拥有马匹与战车的数量在诸侯国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正是有了这些马的参与,才有了这泱泱齐风八百年,才留下了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